

多克托罗《大进军》中美国南方女性的 民族身份建构及对现代性的反思

刘可心 胡亚敏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大进军》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E. L. 多克托罗所著的内战小说。内战时期是美国民族身份建构的黄金时期。小说中的四位美国南方女性马蒂、珀尔、埃米莉和威尔玛的形象颇具代表性。在战争中,以马蒂为代表的传统女性无法承受战争的重压,而像另外三位一样的年轻女性则成功冲破男权社会和奴隶制的束缚,打破传统置于她们的刻板印象和标签。她们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和自由问题,以“美国人”的身份展开新生活。与此同时,在现代性日臻成熟的 19 世纪,多克托罗赋予了三位年轻南方女性以反拨现代性隐忧的独特品质,站在历史的新纪元反思现代性问题并探讨如何走出现代性困境。

关键词:《大进军》;美国南方女性;民族身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2-0075-08

0 引言

《大进军》是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 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 1931—2015)于 2005 年出版的内战小说。多克托罗成长在大萧条时期,在参军之前学习过哲学和戏剧,此后担任过编辑,也曾在高校任教,他丰富的人生履历最终沉淀为颇具深度和广度的文学佳作。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融为一体,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浑然天成。在《大进军》之前,多克托罗曾创作过多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如《但以理书》(1971)、《拉格泰姆时代》(1975)、《鱼鹰湖》(1980)和《比利·巴思盖特》(1989)等。他的小说结合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手法、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和独特多变的叙事技巧,巧妙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对于自己的身份,多克托罗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并且拒绝‘政治小说家’这样的标签”(Parks, 1991:456)。

《大进军》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末期。1864 年,谢尔曼将军率领北方军队乘势进攻,火烧亚特兰大,穿越佐治亚州,“向海洋进军”。最终,北方军队攻入南、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这场历时四年的内战。全书根据进军线路,划分为“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三章,塑造了大大小小近 40 余名人物,其中既有历史上享有威名的谢尔曼将军也有无名小卒威尔和阿里,既

收稿日期:2022-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与社会’视阈下的二战后美国战争小说研究”(22BWW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22&ZD2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可心,女,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胡亚敏,女,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世界战争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刘可心,胡亚敏.多克托罗《大进军》中美国南方女性的民族身份建构及对现代性的反思[J].外国语文,2023(2):75-82.

有出身名门的南方小姐埃米莉·汤普森也有年轻美艳的玛丽·布泽,既有寂寂无闻的黑人奴隶罗斯科也有雷德·萨特里厄斯这样以高超医术闻名的军医。小说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其中又穿插以第一人称展开的细腻心理活动,使读者不仅能够对“大进军”这一历史事件有所了解,还可以深入人物内心进行细微探察。小说伊始的章节是单个人物或者一组人物的独立刻画,随着情节的展开,本来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却因为战争走到了一起,章节也便不再按照人物划分。“南北战争小说发展中最突出的是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探寻分裂的根源和治愈战争创伤的良方。”(罗小云,2019:39)《大进军》便以一种虚构与真实相结合的历史重建方法重建美国社会,治疗战争创伤。

南方女性神话中有身份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除了最规范的南方淑女叙事之外,还有虔诚的农妇、穆拉托女人和黑人保姆等不同的形象”(平坦,2010:19)。多克托罗在小说中就塑造了这样四个颇具代表性的南方女性形象,她们是种植园主夫人马蒂、有着洁白皮肤的混血儿珀尔、出身贵族的南方淑女埃米莉和黑人奴隶威尔玛。多克托罗的写作,正如在内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摄影技术一样,暗示着“历史依赖于对历史事件的积极选择和权衡”(Seymour,2009:66)。通过她们的战争经历,多克托罗向读者展示了内战对身份认同的冲击以及对美国民族身份建构的影响,同时也表达了对这场战争所体现的“现代性”隐忧的反思。

正是在内战的大背景下,性别、种族、阶级、职业、地域身份各不相同的美国人逐渐对他们共同的身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提到美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四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7世纪和18世纪初到独立战争前的二三十年,这时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将忠诚感局限于其所在地域。第二个阶段是美国独立后,此时人们的地方观念仍旧很突出。第三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始,即内战结束后,美国国民对国家高度认同,“美国进入了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胜利时代”(亨廷顿,2005:91)。第四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美国国民身份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内战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为人们构筑“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必要条件。

现代性在19世纪日臻成熟,南北战争的战火不仅燃起了美国国民身份认同的热潮,现代社会的种种特征也渐渐明晰,这在小说《大进军》描绘的战争进程中有明确的体现。北方军所到之处,黑奴获得自由;在炮火的冲击下,人口大范围流动;医学科技的进步使肢体残缺的伤兵也能继续求生,对个人主义的推崇使人们做出各样利己的选择。《大进军》中的主要人物,大多因战争而受创,多克托罗试图以此提醒他的读者,“散播开来的暴力会粉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留下的将是异化和痛苦,而这些是难以治愈的”(Hales,2009:152)。

汪民安将现代性总结为“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置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2012:6)。“发展变革、实用主义、理性自由逐渐成为启蒙现代精神。”(黄丽娟,2017:16)对现代性负面意义的反思则始于20世纪。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言,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政治自由作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社会进步”,但它们也同样成为现代性的三大隐患。小说不仅反映了这些“现代性”对当时美国人身份建构的进步意义,同时,多克托罗站在历史的新纪元,超越了内战时期的历史局限性,赋予了三位坚韧的年轻南方女性以消解现代性隐忧的独特品质,向读者揭示了“现代性”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忧患,体现了个人选择对现代性的反拨。

1 马蒂:被战争击垮的脆弱灵魂

《大进军》描绘的第一个场景是种植园主约翰一家因战逃亡的情形。这场战争带给主妇马蒂无法愈合的创伤。当战火还未烧到家门,她的表现就已经预示出她的脆弱。“她感到那是被烟熏黑的自己的生命正在天空中飘散而去。”(6)战争迫使她离开昔日的家园,失去顶天立地的丈夫和她疼爱的儿子,但是家破人亡的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获得自由、重构身份。最终,她在战争中忧思过度,精神失常。她的悲剧在于多年来父权制、家长制和奴隶制思想对她的侵蚀,以及在原子化个人主义影响下形成的自利性格。

作为一名种植园主妇,马蒂把自己圈定在这一身份的牢笼之中。社会把第一性给予男人,而女人则属于第二性,她屈从于社会赋予她的第二性。她一直过着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按照南方前现代的传统,她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一个忠诚的妻子,一个精明、有眼光的母亲,她很会算账,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家”(92)。但是马蒂一味服从丈夫约翰的安排,生活的目标是使他过得舒心,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规划和展望。战乱之中,她因为丈夫去世、两个儿子在战场上生死未卜而丧失理智。流亡的路上,她重新衡量自己的一生和与丈夫约翰的关系,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是她此刻仍然没有意识到丈夫已经“疯了”,选择继续听从他的决定。她人近中年,社会和家庭长期的重重束缚使她丧失了重构新身份的能力。

马蒂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事不关己,便视而不见。她并不在乎种植园中有多少人正饱受虐待。对于丈夫约翰和女奴南希·威尔金斯的私生女珀尔,她也压抑了心中的善良,“在这这么多年里,有多少次她曾想要摸摸这个漂亮的孩子,有多少次她曾想要使她生活得更容易些。但是约翰根本不想和她有关系,而顺着他是很容易的”(94)。面对搬空的家,卖掉的奴隶,她感到心灰意冷,“没有佐治亚的世界提供给她和她家人的身份所要求的一切,她该怎么过活”(6)。战争的车轮滚滚而来,历史的巨变悄然发生,而她却只在乎自己原本平静的生活会怎样天翻地覆,个人主义在她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对此,查尔斯·泰勒指出,在现代性包裹着的社会中,在个人主义的指导下,“他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2001:4)。马蒂的目光局限于个人和家庭的一时得失,她只在乎生活中的舒适与安宁,对战争毫不关心,她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在战争面前也就变得不堪一击。

2 珀尔:对种族身份的不断探索

面对战争,与“继母”马蒂的慌乱形成鲜明的对比,珀尔显得十分平静,但是她的内心却无比激动,她“感到热泪在她的嗓子里翻腾”(7)。珀尔是种植园主约翰和一个黑人女奴的私生女,她洁白的皮肤使人常常误会她混血儿的身份。她在亲生母亲的墓前低语,请求上帝“教会”她自由,但珀尔寻求自由和构建身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她曾将自己“出卖”给白人,怀念昔日生活的种植园,面对爱情主动思索自己的种族和性别身份,这一切经历使她最终成长为一个能够正视自己身份的女性,并且以对他人的善意和关怀消解了现代性下个人主义带来的困惑。

在私有制的秩序中,“文明社会对自由加以摧毁,而向奴役和枷锁迈进”(汪民安,2012:153)。南北战争打破了传统南方社会种植园中的奴役和枷锁,但是此时的珀尔只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在粮秣征集队克拉克中尉的帮助下,她进入北方军队成为一名鼓手,在克拉克牺牲后受到谢尔曼将

军的保护。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在医院获得了埃米莉的帮助后,留在了军医雷德·萨特里厄斯的医疗队伍当中,成为一名护士。这段时间里,她“麝香石竹花一样白”的皮肤是她的通行证,可是她不标准的发音却成为她的阻碍。因此她努力学习和模仿白人的发音、谈吐和行为举止,使自己能够受到保护。“作为一名少年鼓手,尽管她的技术差强人意,但是她鼓手的身份意味着她获得了安全。”(Gajda, 2018:89)但无论如何,她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无法消除,她始终是被北方军队白人男性凝视的“他者”。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论述少数族群通过伪装自己进入主流话语以使其内在谬误暴露的理论,但是对于珀尔而言,她对白人的模仿却不带有化解“他者”身份的目的。在一次和男友斯蒂芬·沃尔什的谈话中,她终于发觉自己“在卖掉我自己”。自离开种植园以来,她一直使自己依附于白人,“她的活动都是作为一个白人,和白人们生活在一起,有一个白人后妈,并且身穿白人北方军的制服掩饰起自己的黑人本质。哦,上帝呀,这样一种深深的羞耻压倒了她”(216)。自此,她决定她只属于她自己,不再依附任何人生活,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在黑与白之间的不断探索中,她选择坦然接受混血儿身份。她告诉男友,自己会给他生一个黑孩子,她无私地帮助黑人小男孩儿戴维,更多地转向对黑人文化的认同。男友斯蒂芬·沃尔什曾想到:

如果南方占了上风,在理论上可能会有一个时期,仅仅是白皮肤将不能保证一个自由人的身份。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契约束缚,被戴上脚镣手铐,在拍卖场被卖掉,黑色只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奴隶阶级的思想则是最基本的前提。(159)

他的想法与霍米·巴巴的观点不谋而合,改变“他者”的地位,获得自由,不能以一种宏大叙事对抗另一种宏大叙事,那样带来的将是另一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对于珀尔,作为一个美国人,她无需模仿白人,也无需固守在故乡,她可以进入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和白人男友开创幸福的未来。

在追寻自由的道路上,珀尔不止一次怀念起自幼成长的南方种植园和永远埋葬在那里的母亲:

那里有她所热爱的田野和树丛。她从小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她熟悉那里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灌木丛。但是,最让她担心的是如果她不在那里,她母亲的坟墓就会被人们忘记,就会没有人关心和照顾。奴隶们的住所依然矗立在那里。(37)

对于故乡,珀尔有着强烈的地方依附和“恋地情结”,这里的“地方”与具体的区域是分不开的,在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看来,这里是价值的中心,人和“地方”的感情是复杂而具有伦理意义的。然而战争带来的现代生活却生生拆散了珀尔与她的“地方”,使珀尔始终生活在流动不定的空间之中。“现代人在动荡中被反复地抛向了无家可归的状况。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劈风破浪的船上剧烈地晃荡,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到达风平浪静的港湾。”(汪民安, 2012:29)对于未来,珀尔知道的仅是她会把克拉克中尉写的信转交给他的家人,即使她如愿就读了医学院,而后的生活也仍然充斥着不确定性。西美尔和波德莱尔都认为现代生活或都市生活充满瞬间性,这与前现代的乡村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对于珀尔来说,战争中的流动使她频频回想起故乡生活的安宁,但追随自由的代价就是随之而来的都市生活中的变动不居与碎片化的、瞬间的、易逝的现代生活。她需要始终铭记她的地方,即她成长的种植园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情感,如此反拨现代社会中的人情淡漠。

多克托罗笔下的珀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现代社会,人们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受到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要求的侵害”(泰勒, 2001:2)。世界的祛魅带来的是更高的目标感丧失,进而导致个人主义的黑暗面凸显,人们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狭

隘化。这不仅会使个人的生活丧失意义,更会导致对他人关心的缺失。然而,珀尔却并非如此。面对曾经高高在上的“继母”马蒂,她以德报怨,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如果说在战争中照顾马蒂,珀尔仍带有一定目的性与功利性,因为她需要马蒂教她读书认字,那么她将自己仅有的两枚金币之一交给她的哥哥和马蒂,则是出于不求任何回报的善意。作为一名护士,她学着像埃米莉一样给予病人呵护。在和斯蒂芬相遇时,“她曾经握着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放在一桶凉水里,然后给他抹上药膏。在她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施展了个人行为的魔力”(158)。遇到黑人小男孩戴维后,她选择用自己的另一枚金币来保证他的平安。在个人主义泛滥的年代,珀尔的视野没有局限在自己身上,她选择帮助和她一样处于困境之中的人们,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珀尔以她善良的胸怀在现代性发端的美国社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

3 埃米莉:对现代理性的有力回击

南北战争冲击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伴随战争而来的社会流动赋予南方淑女埃米莉·汤普森成长为一名独立女性的机遇,使她可以在战争中独当一面。战争前后,埃米莉虽然受到法官父亲和军医雷德的保护,但同时也被他们牢牢束缚。早在卷入战争之前,她就对男权社会充斥着男性气质产生了反感,并保留自己生活的意识:“他们令人压抑的男人气息使她身心交瘁。她意识到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对他们的性、对其动物性的反感。”(23)即使是她亲爱的哥哥也“常常促使她脱离自己的生活”。但是“战争之伟力和它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要抹掉直到此刻之前的她的全部过去”(28)。对于失去了父亲庇护的埃米莉来说,战争的逼近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她的那双眼睛中有一团火,这火并没有被她的悲哀所耗尽”(28)。

她在战争之初追随雷德这一选择,没有在一开始就帮助她挣脱男性气质的牢笼。她对雷德的追随看似并非盲目,因为雷德“置身在周围的这场大屠杀当中,看起来却那么神圣”(25)。埃米莉被这名医生的善意打动,并且“坚定了她对于自己应当干什么的期望”(25)。她加入雷德的队伍,学习护理知识,开始照顾伤员。但是这种依附于男人的决定是不体面的,在后来也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在行军途中,埃米莉被一名老妇人误认为是妓女。在北方军面前,这个老妇人是“一个哭泣的恳求者”,但是当她看到埃米莉时,“她端起肩膀,猛地向后一仰头,摆出一副傲慢的表情”(49)。从前,埃米莉是一名南方淑女,受过良好教育,母亲去世后,她总是充当女主人的角色。而此时的她却感到自己仿如“一个厚脸皮的荡妇在行军中发现了雷德·萨特里厄斯,并且和他结合在了一起”(47)。被一个身份低微的老妇人蔑视,埃米莉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但真正促使她离开雷德,成为一名孤儿院负责人的,是她对雷德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抗拒。

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现代性的过程即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并且理性“几乎是不可置疑地相信自己在不断地进步”(汪民安,2012:6)。人们笃信,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进步的。在小说中,这种对理性的推崇在医学专家雷德·萨特里厄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相信“我们拥有文明所定义的一切”(51)。雷德一直期盼着技术的进步,并且为之不懈努力。但是当一名黑人妇女遭受了不堪的肉体折磨,雷德为她医治的场景却使埃米莉感到十分不适。“即使是任何人类身体最私密的地方也不能逃过这位医生的毫不客气的探索。”(160)埃米莉反思,“现代世界由于科学的进步是幸运的,但是她在此刻却不禁感觉到这种男性入侵的不恰当”(160)。“理性的人摆脱了上帝和自然的双重阴影。”(汪民安,2012:5)雷德笃信科学,以理性为全部生活的指导,却对埃米莉所提

的人文关怀不以为意。他称精神失常的马蒂患上了痴呆症,然而现有的医学知识并不能探察马蒂的脑部损伤,雷德因此将马蒂的病症归为无解。埃米莉则认为马蒂遭受的痛苦源自其“灵魂的折磨”,但雷德对此不以为意,他甚至对埃米莉使用“灵魂”这个词汇感到失望。以雷德为代表的人之所以热衷于理性,是因为理性可以提高效率。在现代社会,人们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即为了达到最经济划算的目标而考虑行事的合理性。所有标准都被“效益”这一唯一的标准取代,并且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寻求技术上的解决”(泰勒,2012:7)。

雷德的这种工具理性不光体现在工作中,即使在生活中,他也将这种理性运用到了极致。在和埃米莉初次结合时,他为她“动了一台小手术”以减轻她的疼痛,那时埃米莉不幸看到了他认真严肃因而显得十分没有人性的面孔,“使她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病人而不是被爱的人”(121)。埃米莉逐渐改变了她对雷德的看法,“他是一个一心要损害既成的世界的魔术师。”(177)离开时,她对雷德说:“你是他们的门面,靠着这个门面他们使自己相信他们是文明人。”(177)

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泰勒引用了帕特里莎·本纳的论证,恰好说明了雷德的医术和埃米莉的护理之间的关系。现代医学和护理是相互配合的,医学更注重科学性,而护理则更注重人文关怀,倾向于将病人看作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场所”(泰勒,2012:7)。比起医学技术专家,护士反而更能提供具有人情味儿的护理。埃米莉始终用自己女性的关怀力量应对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灾难。埃米莉背叛了对南方的忠诚,可是她却对此没有负罪感,因为她同医生一样在阻止灾难的泛滥。

女性主义学者提出关怀伦理学,以反拨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伦理形态主要地位的自由主义和正义理论。自由主义和正义理论以个体是理性的为前提,强调将公平正义作为选择的准则,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则质疑这一伦理形态的根基,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需要的是“照顾、责任、护理、同情和需求被满足的状态”(Robinson,2011:25),而这些是工具理性无法提供的。面对源源不断被送来医治的伤员,埃米莉“尽可能用温和的言语安慰他们的伤痛”,甚至连崇尚医学技术的雷德也承认,“一个女人的护理对于使男人们安定下来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表面那么多”(47)。她的关怀不仅治愈人,还能够感染人。埃米莉将第一次来月事的珀尔从企图强迫为她检查身体的医护中解救出来,带领珀尔走向从女孩儿向女人的转变。她的关怀也成功感染了珀尔,她继承了埃米莉照顾伤员的责任。

当埃米莉再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她在为孤儿院采购物资。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需要被保护的對象,她挣脱了男性的束缚,也挣脱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支配,正如埃米莉自己所言,“我并不把生活贬低为只限于它的感情,我是把生活扩大到包括它的情感”(177)。她以关怀的力量感化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国人对抗现代社会对理性的极度推崇。

4 威尔玛:获得解放的黑人身份

小说对威尔玛的叙述并不多,但作为一个黑人奴隶,她正是这场战争解放的对象,她的身份理应在这场战争中建构起来。威尔玛在小说中第一次发出声音,她的台词是“是,遵命”(21)。她自幼就在埃米莉·汤普森家干活儿,和小姐一同成长,她学会了读书写字,可是她与埃米莉的阶层和种族差距却始终无法跨越。在处理好原主人家的善后事宜后,她毅然告别了这个将她视为奴隶的地方,加入获得解放的黑人队伍,去寻找她的自由。在行军途中再次遇见曾经的主人埃米莉时,她的

内心再次掀起波澜,这说明“那个奴隶依然在我的心中”(104)。男友科尔浩斯·沃克提点她:“你自由了,你忘了吗?”(79)此刻的威尔玛不禁热泪盈眶,她又一次向自己确证了自己的自由身。

威尔玛和在行进途中遇到的黑人男友沃克都具备养活自己的本领。威尔玛在汤普森家做事,家务活儿娴熟,又会读书写字。她“总是习惯于照顾人,即使在向自由的进军中,她也发现自己很有用”(58)。沃克知道如何种地,还非常有音乐天赋。在行军路上,依靠沃克的捕捞技术和威尔玛的烹饪本领,他们将生蚝变成了美味的食物,获得了自由路上的第一桶金。对于未来,这两个拥有不同能力的人有相异的想法。威尔玛曾经从原主人大法官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城市的传奇,向往在那里展开新生活。而沃克则认为在城市中,他们依旧只能为他人服务,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最后威尔玛选择听从男友的建议,接受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土地,成为农民。他总是“对他们俩的未来有各式各样美好的理想”(80)。在二人的关系中,威尔玛看似占了上风:她负责管理二人赚的第一桶金。在展望未来时,她说,“一个是你,作为家长,一个是我,作为真正的家长”(108)。可是事实上,对于重大的决定,威尔玛则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沃克,这说明她的独立意识还不够强大,但是对于一个刚刚脱离生活环境的黑人女孩儿来说,她的想法已经表明她挣脱了前现代社会对她的束缚,她和男友正在朝着一个现代美国人的身份转变。

小说并没有点明威尔玛的结局,而是停留在了她和沃克的美好幻想之中。事实上,南北战争并没有使这些黑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平等。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关注过“解放”和“自由”的区别。“政治解放虽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绝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王福生,2012:64)自由不单是与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事件,更应该是公民在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美国黑人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对于威尔玛来说,获得自由已经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她或许目前没有能力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她和沃克选择接受政府的安排,从此只专注于自己的家庭,不免让人担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心中”会导致忽视公共生活,丧失政治控制,从而导致政府的温和“专制主义”。对于威尔玛来说,这种“政治自由”可能会是内战为她构筑的民族身份所缺失的一部分。

在威尔玛烹制生蚝之前,她发现了一个厨房,里面有几个黑人,他们欢迎她使用那里的炉子。生蚝出炉之后,威尔玛也非常乐于和黑人弟兄们分享。在充满苦难的行军路上,黑人们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互帮互助的传统。这也为黑人群体在构建民族身份时提供了出路。他们需要团结,而不是成为一个个互不相交的原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护自己的“政治自由”。

5 结语

一个特定的身份能够充当个人的行为指导,而民族身份是身份的一个关键维度。在小说《大进军》中,多克托罗塑造的诸多南方女性,在同一个民族身份的指导下,展开了新的生活。马蒂人近中年,多年来,作为种植园主夫人,对丈夫的不忠忍气吞声,对黑人奴隶的态度却居高临下,战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超越了她的承受能力,因此她在其中感受到的更多是精神刺激和创伤。从某种程度上讲,以马蒂为代表的老一辈女性受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影响过深,难以适应新生活,多克托罗将更多希望寄托在另外三位年轻女性身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们得以冲破男权社会和奴隶制的束缚,打破传统置于她们身上的刻板印象和标签,以“美国人”这一身份展开新的生活。身份不是个人一成不变的定义,身份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内战中,珀尔、埃米莉、威尔玛三位

年轻的南方女性突破了重重限制,不断建构起她们作为“美国人”的民族身份,她们自由、独立、平等,充分享有“美国人”这一民族身份带给她们的权利,同时也担起自己民族身份的责任,在民族身份的统领下,展现个人的魅力。多克托罗在消解美国内战宏大叙事的同时,对于“美国人”的民族身份建构提出了美好的愿望,使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南北战争对“美国”国民身份的塑造,感受到战争对个人身份的建构力量。

参考文献:

- Gajda Marek. 2018. The Role of Military Music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G]// Crhova, Marie & Weiss Michaela. *Silesian Studies in English* 2018. Opava; Silesian University.
- Hales, Scott. 2009. Marching Through Memory: Revising Memory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J]. *War, Literature and Arts* (21):146-161.
- Parks, John G. 1991. The Politics of Polyphony: The Fiction of E. L. Doctorow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 454-463.
- Robinson, Fiona. 2011. *The Ethics of Care: The Feminist Approach to Human Security*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eymour, Eric & Barrett, Laura. 2009. Reconstruction: Photography and History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J]. *Literature & History* (2):49-69.
- E. L. 多克托罗. 2007. 大进军 [M]. 邹海仑,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均引自本书,只在文中标明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 查尔斯·泰勒. 2001. 现代性之隐忧 [M]. 程炼,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黄丽娟. 2017. 永恒的变奏曲:西方现代性的动态机制 [J]. 外国语文 (6):9-14.
- 罗小云. 2019. 分裂与疗伤:美国南北战争小说的发展 [J]. 外国语文 (2):39-45.
- 平坦. 2010. 南方女性神话的现代解构——以韦尔蒂、麦卡勒斯、奥康纳为例的现代南方女性作家创作研究 [D]. 长春:吉林大学.
- 萨缪尔·亨廷顿. 2005.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程克雄, 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 汪民安. 2012. 现代性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福生, 曹广开. 2012. 革命、解放与自由:阿伦特与马克思 [J]. 东岳论丛 (7):61-66.

Women's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merican South and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LIU Kexin HU Yamin

Abstract: *The March* is a Civil War novel written by E. L. Doctorow, a famous American novelist.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is the golden ag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The images of four women in the novel, Mattie, Pearl, Emily, Wilma, are all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American women. During the war, traditional women like Mattie cannot bear the impact of war, while young ladies, such as the other three females are able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slavery as well as the stereotypes and labels that tradition has given them. They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and freedom, and begin their new life as "American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Doctorow has endowed the three southern American women certain qualities to counter the malaises of modernity. He has provided a solution for modernit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he March*; Southern American women;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ity

责任编辑:龙丹